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3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3 2009
(第8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8)

论政治价值的理性证成

田志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6)

摘 要:从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理性动力、理性运思与理论形态四个方面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证成。首先在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视域中从客观理性、上帝神性、演进理性与主体理性的视角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其次指出:理性,作为政治主体的内在规定与政治发展规律的主体向度而启引着政治价值的创生、批判着政治社会的价值现状、推动着政治价值理想的实现。再次,从理论理性的逻辑推演、价值理性的前提先设、工具理性的设计建构等方面分析了理性对政治价值体系的思维运演。最后,指出了政治价值的最高理性形态是政治哲学理论,无论是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还是非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实际上都是理性主义的。

关键词:政治价值;理性;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9)03-0069-07

政治价值是在政治实践中产生、形成、发展的政治事务、政治现象对特定政治主体生存、发展、利益的肯定性效用,是在生产方式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发展的关于政治社会和政治主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应然状态与评判准则。政治价值以政治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的实践活动为客观基础,以政治主体的内在尺度为主体根源。政治主体的内在尺度是具体多样、动态发展的,它既在一定的政治生活中展现其多彩多姿的面相,同时也作为政治实践的主体向度而成为政治发展的深层动力。理性[①],作为政治主体最主要的内在尺度之一,是人所独有的把握、改造对象世界和自我世界,调节与控制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精神力量与主体智慧。在政治实践中,理性使政治主体能够把握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深层本质、客观逻辑与必然联系,也使政治主体自身能够省察、反思、发现、论证、确立与其内在尺度相契合的关于政治社会与政治生活的评判准则与价值理念,从而在政治价值的论证、创生、变迁中展呈政治发展的主体本质力量。

一、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

在政治社会发展的童年时期,古代政治哲学家认为政治价值的深层根源与本质依据在于"逻各斯"、"理念"或"天道"之类的自然理性、客观理性或宇宙理性。斯时,在价值现实与价值观念、价值必然与价值理性、价值客体与价值主体的多维二元关系中,主体意识的价值观念自发而模糊,价值主体潜隐于价值对象中,价值理性蕴涵于价值必然的襁褓里。从古希腊的远古神话到阿那克

收稿日期:2009-04-27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项目(NCET-06-0503)

作者简介:田志文(1971—),男,湖南沅江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

① 我国著名政治哲学学者顾肃认为,广义的理性主义既包括经验论,也包括唯理论。参见: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西曼德的“无限者”、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①,从毕达哥拉斯的数到柏拉图的理念、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客观理性、自然理性或宇宙理性被他们界定为政治活动必须遵循的绝对命令、政治生活价值判定的终极尺度、政治组织自然生成的天然演绎、政治价值创生的最终根据。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规范性政治价值都是客观理性、自然理性或宇宙理性的命令与要求,国家、社群、权力等工具性政治价值是客观理性天然生成与演化的结果。客观理性、自然理性或宇宙理性规制着世俗政治生活。因之,在古典政治哲学理论中,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是客观理性。

在中世纪神权政治哲学的漫漫荒原里,理性被附着在神性中,自由、人权、平等、正义等规范性政治价值沐浴在上帝的光辉里,国家、权力、社群等工具性政治价值俱皆于教权的笼罩下。“进入中世纪,古典政治思想被摧毁或遗忘了。”[1]托马斯·阿奎那这样明确地指出了善恶判断与政治价值的自然理性之源,他说:“我们赖以辨别善恶的自然理性之光、即自然法,不外乎是神的荣光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2]因之,在中世纪神权政治哲学理论中,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是上帝神性②。

当政治发展的历史车轮驶入近代之时,伴随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沉思,主体理性从上帝神性中分离出来并日益凸显于神性之上。在主体理性的反思与召唤之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政治价值逐渐剥离宗教神学之神圣外衣。此时,尽管政治价值的深层本源依然源自于自然法的客观理性,但随着主体内在尺度的日益丰富和人的主体理性的日益彰显,政治价值创生的理论路径已日渐转向于主体价值理性的先验设定或理论理性的逻辑论证。在近现代自由主义的自然法与契约论理论中,政治价值是自然法(理性法)的命令与要求,而“自然法是正确理性的命令,它根据合乎理性或违背理性指明人的行为在道德上的可行与否”。“任何与我们的理性和社会性相合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公正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3]他们甚至指出:“理性,也就是自然法。”[4]6而自然法本身就是政治价值规范,正如霍布斯所说的那样:“自然律是理性所发现的诫条或一般法则。这种诫条或一般法则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的生命或剥夺保全自己手段的事情,并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5]97因之,在近现代自由主义的自然法理论中,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是客观理性和主体理性。

即使有“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之称的保守主义③政治哲学,也并非一般地否定理性,他们反对的只是彻底根治人性恶端与政治痼疾、设计完美理想政治社会的理性至上主义。保守主义守护的至上政治价值是传统,因为传统和历史是“智慧和良知的指南”[6],传统体现着无数先辈的集体理性与经验智慧。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把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所尊崇的传统与经验所内蕴的理性叫作演进理性或历史理性,把凭以设计至善至美政治社会的理性叫作“建构理性”。演进理性主义认为,政治价值体系的创生与变迁是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而建构理性主义则认为政治结构的变迁与政治价值理想的实现是人们依据理性的力量与智慧人为追求与设计的产物,是大规模的自觉改造社会的结果[7]。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至为推崇的是演进理性,无情批判的是建构理性,就像波普尔所批判的那样:“每个试图在地球上创造天堂的人,带来的都不过是地

①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认为,“在一切变化和矛盾中唯一常任或保持不变的,是位于一切运动、变化和对立背后的规律,是一切事物中的理性,即逻格斯”。参见:[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5年7月版,第22页。

② 上帝神性的本质是客观理性。

③ 约翰·麦克里兰认为,作为“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保守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参见: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73页。

狱。”[8] 因之，在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中，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是演进理性或历史理性。

马克思的政治价值思想更是浸润着浓郁的理性气质与普世的价值关怀。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来分析、发现政治发展的客观逻辑（“是”），并通过真实的人的活动即实践发展的辩证法来达到政治“应该”，以此来弥合政治价值理想（政治“应该”）和政治现实（“是”）的断裂。马克思通过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理性自觉建立了一种“应该”（政治价值理想）与“是”（政治价值现实）相缝合的桥梁。在这里，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的桥梁就是人的主体理性。通过主体理性桥梁的沟通与政治实践的奠基，政治价值的主观形态与客观形态①既相互区隔、相对独立，又相互缠结、相互内蕴。

二、政治价值的理性动力

政治现实的价值批判需要理性的省察，政治理想的价值追求需要理性的设计与论证，现实政治体系的价值合理性需要理性的合法性辩护，政治价值的创生需要理性的发掘与演绎，政治价值的变迁需要理性的助推与导引。因此，政治价值现实、政治价值规范、政治价值理念、政治价值理想等整个政治价值系统的变迁无不渗透着理性的论证与阐释、理念的沉淀与内化、理想的追求与向往。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这样指出：“理性应是我们最高的法官，应当指导所有事物。”[9] 弗洛姆更直接地指出：“人类历史的推动力内在于理性的存在中，通过理性，人创造了人自己的世界。”[10]56 洛克和弗洛姆对理性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或许言过其实，但是在政治社会的变迁与政治文明的发展中，我们须臾离不开理性“这个地球上最美的花朵”。“理性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普世力量”[11]，作为政治主体的内在规定与政治发展规律的主体向度，是一切政治价值创生与变迁的主体动力。这种动力作用体现在：

第一，理性启引着政治价值的创生。对政治价值创生的系统理性论证无疑首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自然法和契约论自由主义思想家对政治价值的论证深刻地影响着并导引着政治社会由专制时代进入民主时代。他们先在设定了一个美好但又有种种不便的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状态或“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为了消除自然状态的种种不便或为了把“人人互相为战的战争状态”[5]96 改造成为自由、和平的秩序状态，在客观理性的启示和命令下，在主体理性的反思与权衡下，理性促使人们“想出一种反自然的解决办法”。于是，处于自然状态的初民们签订社会契约、制定人定法，成立国家、政府、社团，从而过上自由、安宁、秩序的生活。费希特在《我们时代的特性》中指出：“人类尘世生活的目的即是用依照理性的自由，去把所有人类关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12] 在自然法和契约论自由主义的视域中，政治价值是理性法的规定与命令之天然生成，“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4]6 正是理性法与契约论开启了西方近现代“自由、平等、民主

① 笔者认为，在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政治价值有两种形态，一是客观形态的政治价值，它是指在政治实践基础上政治主体之间和主客体之间的客观相互作用在特定政治主体身上的肯定性客观效用、在政治主体之间形成的客观性价值关系及其变迁与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主观形态的政治价值，它是指政治主体的理念追求与政治理想，是政治生活的实践判则。作为实践判则的政治价值意指政治价值在政治生活中充当政治之善恶及优劣的评价标准，它是政治主体对客观政治价值关系与主体内在尺度进行理性认识与逻辑推演的产物，彰显着政治主体对各种政治行为、政治现象是否契合其自身生存、发展、利益、幸福等自明性政治价值的理性分析。作为理性追求与政治理想的政治价值，它是指政治主体在理性认识与分析客观性政治价值及其发展必然的基础上所追求的符合其内在尺度与要求的理想政治社会。

的正义”的理性王国。

笔者认为,为了实现政治主体的生存、发展、利益、幸福等目的性政治价值,政治主体在利用、凭借政治机器来处理、调控他们之间利益矛盾与价值冲突的过程中必然运用一定的评价尺度与评判标准,这些尺度与标准除了需要主体价值理性设定生存、发展、利益、幸福等目的性政治价值作为最根本的标准以外,还需要另一些规范性的政治价值作为基本标准。在生产方式发展的基础上,政治主体的生存、发展、利益、幸福等价值诉求必然使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理性地寻求秩序性、独立性、自主性、平等性,理性地寻求摆脱丛林法则、不平等关系、从属关系、不自由关系。这样,由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决定,在目的性政治价值和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强烈驱动下,在政治实践的价值诉求与政治理性的逻辑运思下,政治主体①理性地寻求、提出、论证、确立政治秩序、政治权利、政治自由、政治平等、政治民主、政治正义等合乎政治人性以及社会公共善(在本质上体现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的规范性政治价值。他们寻求、提出、论证、确立政治价值的过程渗透着政治主体浓郁的理性气息、彰显着政治主体严整的致思逻辑、凸现着主体价值理性的人文关怀。

第二,理性批判着政治社会的价值现状、推动着政治价值理想的实现。政治主体通过理性的自觉意识或批判政治价值现实或设计理想政治结构以实现政治价值理想。正是理性的批判性开启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时代图景,在此过程中,启蒙理性开启了“一个特别意义上的批判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要服从批判”[13]。康德认为,大自然“把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赋予了人类”[14],而批判是理性的内在功能。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在启蒙理性的扫荡之下,“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面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15]

毫无疑问,理性对现实无情的“扫荡”使政治主体的主体意识与自觉意识日益提升,也催生了近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人权的理性的政治价值王国。但是,离开政治主体的自觉行动的实践活动规律,政治文明的价值之魂必然失却现实的根基与前进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社会发展与政治价值变迁是政治主体实践活动规律发展的结果,但人的行动的规律的特殊性使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深蕴着主体的价值向度与理性要求。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规律的展现和主体意识的提升,主体理性日益自觉、日益深入地认识到政治发展的规律与方向及其主体价值向度,自觉地理性地创造着推动历史前进的客观政治条件,自觉理性地设计出理想政治图景。在此过程中,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内容的主体理性力量在实践中通过政治价值的发现、创生、论证、确立而日益深入地认识政治发展规律及其主体价值向度、日益自觉地实现其政治价值理想。

三、政治价值的理性运思

钱永祥指出:“在政治领域,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求对各种现实的(或者理想中的)体制、政策进行排比评价、作出好、坏、对、错的分辨。即使最功利最现实、最讲求机巧策略的政治人物,只要他还需要为自己的作为找理由(所谓找理由,当然就是认定所找到的理由是‘对/好’的),

① 人民是至高至大的政治主体,政治哲学家是其思想代表。

就不得不介入这种涉及比较与评价的思考。评价当然需要标准，标准就是各种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可是这些原则与价值为什么是对的？是大家应该接受的？是政治制度与政策之所以成为‘正当’的好理由？”[16] 这种对价值的反思与考量即是理论理性对政治价值何以产生、存在与变迁的论证与运思。在政治主体对政治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价值追问与理性解析的过程中，由于理论理性对政治价值的思维运演而形成了观念形态的政治价值体系。

当然，并非所有政治价值，都需要理性的逻辑证明与理论推演，对于生存、发展、幸福、人权或功利等目的性的政治价值，政治哲学家们往往通过价值理性之心智直观、自明公设或上帝赋予来把它们当作前提性的价值先设并作为其理论推演的逻辑前提。例如，对于生存、发展、幸福、权利或功利等目的性的政治价值，虽然其本身无法加以理性的逻辑证明，但它们是一切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前提。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家密尔把个人苦乐的“功利”原理这个价值先设称之为政治哲学的“第一原理。”他认为，“一切第一原理，我们的知识的最先前提和我们行为的最先前提，都是不能够有推理式的证明的。但是，知识的第一原理，因其是关乎事实，可以直接取决于判断事实的心能；这些心能就是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内省。”[17] 功利主义政治哲学认为，这些自明性政治价值是一些无法也无须证明的公理，而只能诉诸于“心能”之类的价值理性。又如，对于“自然权利来自何处”的问题，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的回答是来自于先验人性或自然、上帝。对此，约翰·麦克里兰的洞见可谓一针见血：洛克之后的“自然权利的理论实际上未曾超越洛克之说，亦即它们的起源是由上帝所赐。世人总是不得不问：自然权利来自何处？仅有的差堪满意的回答永远是：来自上帝。一个自然权利思想家对上帝的属性及上帝所为何事无论有多少怀疑，只要袖里乾坤藏个上帝，需要时亮出来，说人的自然权利是他给的，就永远智珠在握。”[18]

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对于这些目的性政治价值之何以可能，应置之于人类历史发展与政治发展的物质前提与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科学理解，不能把人权、幸福、博爱、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置之于冷冰冰的彼岸世界。当“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19] 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20] 因此，生存是政治发展和历史发展的最根本价值前提，因而也成为政治社会的价值先设。然而，生存只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的生产活动的目的并非只是维持人的生命存在，而是要在社会实践中推动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的积极提升。由此，发展成为一种自明性的政治价值，成为马克思的政治价值理想。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关于发展的价值理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个体的发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团体发展成为“真实的集体”，社会发展成为“自由人联合体”。正是在此岸世界的生存与发展的实践活动中，人权、幸福、博爱、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才能得到现实的科学理解。

在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的视域中，人权、幸福、功利、生存、发展等政治价值先设成为政治生活与政治社会的最根本标准。政治主体依凭这些标准并运用其理性来反思与评判政治现实、设计与安排政治结构。主体工具理性推动特定政治主体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政治权威、政治国家、政治组织、政治团体以实现生存、发展、利益、幸福等目的性政治价值以及政治权利、政治平等、政治自由、政治民主、政治秩序等规范性政治价值。工具理性的凸显须臾不能离开这些政治价值先设与规范性政治价值，甚至必须以此作为自身的根源与归宿，否则，工具理性盲目的膨胀会吞噬价值

理性,导致“处于官僚主义①行为轨道里的人不再是负责的道德主体,他们的道德自主性被剥夺了,并且他们被训练成了不执行(或相信)他们的道德判断的人。”[21]因此,在政治价值体系实践形态的主体向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必须互促互渗、互动互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理性在政治社会发展中的心灵启引与价值导向的功能。

四、政治价值的理论形态

对于政治事务与政治现象,人们总是持有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赞美或谴责的态度与情感,而这些态度与情感都系关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的价值判断,这样的价值判断都是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的。“政治哲学就是要努力探讨这些标准,以期获得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22]由此,古今中外的思想巨擘用自己的深邃洞见与睿智理论演绎了人类几千年政治哲学思想绵延发展的历史画卷。从耀眼辉煌的古希腊伦理政治观、古罗马法学政治观,历经中世纪神权政治哲学的漫漫长夜,到迎来西方近现代人权政治与自由民主政治观的曙光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辉煌理论跃迁,再到后现代主义对普遍主义、中心主义政治等宏大政治理论的解构与颠覆,从根本上都是主体理性对各种政治价值的去蔽与论释、追求与向往。可见,两千五百年的西方政治哲学史上,政治哲学家们深刻反思政治生活的深层本质,以理论思辨与逻辑演绎催生出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尊严、法治、秩序、正义等基础性政治价值并为其去蔽。因此,政治价值的系统的理性论证体现为政治理论,因而主观形态的政治价值主要以思想、理论和观念的形式而存在,这些政治哲学知识与理论是政治价值的最高理性形态。

当代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虽然致力于消解理性的权威,把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称之“理性的极权主义”(利奥塔语),他们攻击理性主义政治哲学把川流不息、栩栩如生的生活现实理解成为一维的中心与基础以及普遍绝对的宏大叙事,但其对理性主义的普遍主义的政治哲学的中心的解构、基础的摧毁,所用的方法正是理性的论辩逻辑。虽然有些思想家如德里达运用了双关语、笑话等跳跃式、间断式的不协调的写作方法,但又运用了或抽丝剥茧或釜底抽薪的理性的攻讦。虽然他们摧毁了理性主义一个又一个形而上学的政治价值,但又在这些碎片的基础上重构了诸如差异、平等、自由、微观民主等新的本体论政治价值。因此,连海德格尔也这样评论:“非理性主义是一种偏离正道的理性主义,是一种逃避,并不能使我们走向光明,只是使我们纠缠在理性主义中。”[10]118法国学者V·狄康姆也指出:“反对理性是无意义的。理性作为思想的一种形式服从于同一性原则。这就是为什么理性只能被理性反对,真理只能被真理反对,意义只能被意义所反对,一个苏格拉底只能被另一个苏格拉底所反对。”[10]99实际上,在政治价值的非理性主义理论形态中,要么是以理性的逻辑与形式论证了非理性的政治价值,要么是理性的政治价值采取了非理性的思路与形式。因之,后现代主义的政治价值理论仍然是理性主义的。

参考文献:

[1] 丛日云. 西方政治思想史[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2.
[2] 托马斯·阿奎那.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M]. 马清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07.
[3] 汉默顿. 西方名著提要[M]. 何 宁,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111.
[4] 洛 克. 政府论(下篇)[M]. 叶启芳,瞿菊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① 这里官僚主义是指科层制组织机构,笔者注。

[5] 霍布斯. 利维坦[M]. 黎思复,黎廷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6] 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Ci – Cz Volume 4, World Book, Inc. Chicago London Sydney Toronto 1983:793.
[7] 哈耶克. 自由宪章[M]. 杨玉生,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1 – 85.
[8] 戴维·米勒. 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M]. 张之沧,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498.
[9] 王治河. 后现代哲学思潮[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9.
[10] 弗洛姆. 为自己的人[M]. 孙依依,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8.
[11] E·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3.
[12] 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M]. 李小兵,等,译. 重庆出版社,1989:73.
[13]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97.
[14] 康　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1990:5.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 57.
[16] 威尔·金里卡. 当代政治哲学(上)[M]. 刘　莘,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4:8.
[17] 密尔. 功用主义[M]. 唐　越,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37.
[18] 约翰·麦克里兰. 西方政治思想史[M]. 彭淮栋,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281.
[19]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53.
[20]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9.
[21] 齐格蒙·鲍曼. 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 郁建兴,周　俊,周　莹,译. 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304.
[22] 列奥·施特劳斯. 政治哲学史[M]. 李天然,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2.

Reflections on the Rationality Dimension of Political Values

TIAN Zhi-wen
(*Humanities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The rationality dimension of political values can be explained by its rational basis, rational power, rational reasoning and theoretical form. Firstly, the paper analyses its rational ba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jective rationality, God's Divine Nature, evolutional rationality, and subjective rationality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Secondly, rationality are the intrinsic component of political subjects and the subjects component of law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guiding its emergence, criticizing values reality of political society, and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ideal political. Thirdly, the paper analyses its rational reaso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gical reasoning of theory rationality, The default premise of value ration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Last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highest rationality form of political values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ory, and that both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r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rrationalism are essentially of rationalism.

Key Words: political vaues; rationality; political philosophy